

韩国民众“亲美疏中”的现状、原因及应对

王晓玲

〔内容提要〕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对韩国民众的**对华、对美认知进行了量化比较**,发现目前韩国人“亲美疏中”的立场非常明显,相比之下中韩关系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亲美疏中”具体表现为**“联美弃中”“信美疑中”“重美轻中”和“爱美嫌中”**。“亲美疏中”的心态长期存在,在“萨德摩擦”中进一步加剧。“冷战思维”“民族主义”“中国威胁论”都影响着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纷繁复杂,我们应该看清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基本心态,把握目前中韩关系发展中的机遇和风险。长期来看,我们应在深化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推动中韩社会共同发展,夯实中韩互信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韩国民众 对美认知 对华认知 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王晓玲,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韩国社会研究。

过去一段时间里,中韩关系曾因为**“萨德(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入韩滑入低谷,这是中韩建交 20 多年来第一次遭遇来自安全领域的“硬摩擦”,也是韩国“均衡外交”路线的一次震动。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后,积极释放改善中韩关系的愿望,中韩关系进入“后萨德时期”。站在“后萨德时期”的起点观察中韩关系有**很多维度**。本文关注韩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并且以韩国民众的对美认知作为参照**。“萨德”入韩前后,韩国社会就中美两国的影响力进行了充分讨论,这是观察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立场的一个好时机。本文以民意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韩国民众在中美间“选边”的复杂心态,观察目前文在寅政府对华、对美外交的民意基础,思考中韩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长短期问题。

一、“萨德”入韩前后韩国社会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自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追求“均衡外交”以增强国际影响力。全球范围内的冷战甫一落幕,**卢泰愚**就提出“北方外交”概念,发展与中俄两国的关系。金泳三在此基础上提

出“四强协调外交”,同时借力于美、日、中、俄。金大中以“四强外交”为基础,得以提出对朝“阳光政策”。卢武铉政府时期,中韩贸易额超过了中美贸易额,韩国成为典型的“经济拉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卢武铉提出“均衡者”外交论。李明博当选总统之初,曾提出“韩美价值观同盟”,但很快遭到国内舆论“亲美疏华”的批判。此后上台的朴槿惠,在引入“萨德”之前也非常重视中韩关系。从进步派卢武铉到保守派李明博、朴槿惠,再到进步派文在寅,他们的外交理念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都秉持“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并因此而强调“多元均衡”。也就是说,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变化,追求“均衡”的路线在韩国已经持续了近 30 年,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①

在韩国的“均衡”战略中,中美是重要的两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对于韩国而言同样重要。韩美同盟是安保层面的高水平合作,中韩战略合作伙伴更多是经济社会层面的低水平合作。一旦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之间出现张力,就会看到韩国社会内部

^① 参见王少普“韩国的平衡外交及其面临的挑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 年第 10 期,第 6~11 页。

围绕如何权衡两对关系而产生分歧。面对韩美同盟,韩国既担心被“牵连”,成为中美分歧中美国的马前卒;同时又担心“被抛弃”,从而失去与朝鲜对抗的安全基石。面对这一矛盾,进步派倾向于在维持韩美军事同盟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朝鲜以及周边国家、区域组织的关系,以提高韩国的自主能力。保守派倾向于强化和扩大韩美同盟来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刺激中国强化中韩关系的积极性。^①“萨德”入韩前后,韩国社会针对韩美、韩中这两对关系的意义以及进步与保守路线的利弊进行了充分讨论。通过观察分析 2016 至 2017 年一系列舆论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韩国民众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立场选择、信任偏向、合作偏重和情感偏好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立场选择是**有限的“联美弃中”**。从 2016 到 2017 年,多个机构进行的多次民调结果都显示,韩国人中“萨德”入韩赞成者的比例高于反对者。^②在“萨德”入韩问题上,韩国民众的选择是“联美弃中”。分析这段时间韩国政府以及社会关于“萨德”入韩的讨论可发现,**“萨德”向韩国人提供了有限的心理安全感**。从技术上看,军事专家对于“萨德”有效性的评价不同,但大致都认为“萨德”是相对有效的防卫系统。从战略上看,保守倾向的舆论主张接受“萨德”、强化韩美同盟以应对高涨的朝核安全威胁;进步倾向的舆论则认为“萨德”会把东北亚带入新冷战格局,是“特洛伊木马”^③。普通民众无法对“萨德”的技术和战略效果作出正确判断,但在朝鲜安全威胁达到顶点时,韩国政府强调“萨德”是仅有的应对方案^④。结果是自朝鲜 2016 年第 4 次核试验以来,韩国社会自始至终围绕“萨德”入韩争论不休,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起伏不定,但支持的声音或多或少高于反对声音。这些民调结果反过来又被政府作为“萨德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选择“萨德”马上要付出的代价是中韩关系倒退。中韩关系倒退对韩国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但韩国社会的忧虑集中在中韩经济合作退步这一问题上。**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萨德”摩擦使得两国民心疏离,导致“韩流”在中国遇冷、中国赴韩游客大量减少、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遭遇困

难。韩国的很多机构对于中韩关系骤冷带来的经济损失进行了预测。例如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在 2017 年 1 月发布的《2016 年对华出口评价与 2017 年展望》报告指出,2016 年 1 月至 11 月,韩国对华出口贸易同比减少 10.9%。2017 年 5 月,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2017 年韩国 GDP 增长将因部署“萨德”而降低大约 0.5 个百分点。概言之,在韩国人眼中,“萨德”入韩是在安全危机与中韩经济合作受损二者之间作出的选择,是有限的“联美弃中”。

同一时期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虽然在“萨德”入韩问题上选择了“联美弃中”,但也没有放弃均衡路线。笔者于 2017 年 10 月进行的一项面向普通韩国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联美”的代价进一步增大至“与中为敌”,那么多数韩国民众更愿意放弃“韩美同盟”而选择“中立”。^⑤**该问卷假设“中美发生军事冲突”,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中立”的韩国人占 52.7%,是主流,选择“支持美国”的比例为 39.2%。**如果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消失,那么近六成韩国人会放弃韩美同盟而独立于中美之间。^⑥总之,多数韩国民众没有放弃均衡路线,他们对韩美军事同盟、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功利主义的态度。当外部压力发生变化,他们会对韩国的利益得失进行计算,以调整在两对关系之间的位置。但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受访者中也存在积极的“韩美同盟支持者”。无论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这种

① 参见杨鲁慧、赵伟宁“韩美不对称同盟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第 13 页。

② 参见刘天聪“‘萨德’部署的韩国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4 期,第 10~11 页。

③ 参见[韩]高峰俊“损失限制与抑制:韩半岛装备萨德的理论、现实意义”,《韩国政治研究》2017 年第 3 号,第 334 页。

④ 朴槿惠在 2016 年 8 月 15 日韩国“光复节”发言中称“‘萨德’是自卫权”,“政治界如果有替代方案请出示”。见 <http://www.nocutnews.co.kr/news/4639415>。(上网时间:2018 年 8 月 16 日)

⑤ 该调查的调查问卷在 2009 年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课题组所设计的问卷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调整。该调查委托韩国专业咨询公司“Nice Research”具体实施完成。该调查的调查对象为居住在韩国的 17 周岁以上韩国人。该调查以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分布为依据,通过多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样本,有效样本数量为 1047 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创新课题组通过电话回访方式对调查质量进行了验证。

⑥ 上述问卷调查显示,假设“朝鲜半岛统一”,认为“驻韩美军应该撤离”的受访者占 58.8%,认为“美军应该留在朝鲜半岛”的受访者占 34.3%,表示“不知所措”的韩国人占 7%。

超高压压力下,还是“朝鲜半岛实现统一”这种零压力下,有超过 1/3 的韩国人始终选择忠实于韩美同盟。也就是说,在这次“萨德”入韩的过程中,有三成以上的韩国人因为拥护韩美军事同盟而接受“萨德”;有三成韩国人反对“萨德”入韩,他们的考虑是多样的,认为“萨德”入韩的损失大于利益、认为“萨德”危害环境等等;有大约两成韩国人认为“萨德”入韩的安全收益大于经济损失,把“萨德”当作权宜之计。关于“萨德”入韩利害得失的计算结果是决定韩国社会在“萨德”问题上立场选择的关键因素。而“萨德”入韩的得与失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在看似理性的计算中,韩国人对于朝鲜、美国、中国的认识和情感偏向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对中美的信任感的比较是有限的“信美疑中”。对于安全与危险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知。在普通人无法对具体的技术和战略问题作出专业判断的情况下,韩国民众之所以在“萨德”入韩问题上选择“联美弃中”,**根本原因是韩国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有一定的信任,对中国却充满怀疑。**笔者在 2017 年 10 月的问卷调查中通过两个问题测试了韩国人在安全与统一问题上对于中美两国的信任感,分别是“中国/美国是否有助于解决朝核问题?”和“中国/美国是否支持朝鲜半岛统一?”调查结果显示,在“去朝核”以及“统一”这两个攸关朝鲜半岛命运的问题上,相信美国的韩国人数量不到一半,但相信中国的韩国人数量明显更少。^① 首尔大学 2017 年 3 月进行的“统一意识调查”^②中也有问题问“中美两国是否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调查结果再次确认了韩国人对美信任感与对华信任感之间的巨大差距。^③

韩国人不仅在“朝核”和“统一”问题上不信任中国,而且对于中韩关系的敌友定位也很模糊。首尔大学 2017 年 3 月进行的“统一意识调查”要求被访者在美、中、日、俄、朝五国中选择一个“威胁半岛安全”的国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被选中的比例虽然远远低于朝鲜,但远远高于美国。^④ 韩国人对于中韩关系的定位徘徊在警戒、竞争与合作之间,但警戒与竞争的心态远多于合作。^⑤ 韩国人对于韩美关系的定位却非常清晰,绝大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

是合作对象^⑥。上述调查还要求被访者猜想朝鲜战争时中美两国的反应。结果显示,大部分韩国人相信美国会支援韩国,同时近半数韩国人认为中国会支援朝鲜。^⑦ 笔者于 2017 年 10 月进行的调查结果也表明绝大多数韩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对韩国构成威胁。^⑧ **综上所述,在安保问题上,美韩与中朝对立的冷战思维在韩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第三,对经济合作关系的评价是“重美轻中”。中韩关系的引擎是经济合作。**对于韩国人而言,发展中韩关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自 2004 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自 2015 年开始,受全球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但中国依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在 2016 年韩国的总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分别占 25.1% 和 21.4%,而美国在韩国总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分别占 13.4% 和 10.6%。也就是说,2016 年韩中贸易额是韩美贸易额的 1.93 倍,韩国对华出口额是对美出口额的 1.87 倍。

但与韩美经济合作相比,韩国人对韩中经济合作重要度的评价并不高。2017 年 10 月的调查把韩日经济合作的重要度设定为 50 分,要求被访者在 0 到 100 分之间对韩美、韩中经济合作的重要度进行打分。调查结果显示,韩中经济合作重要度平均得

① 认为“美国有助于解决朝核问题”的被访者占 41.2%,而认为“中国有助于解决朝核问题”的被访者占 11.3%。认为“美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者占 27.1%,而认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者占 7.1%。

② 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所”从 2007 年开始,委托专业咨询公司“韩国盖勒普”每年 1 次针对居住在韩国的 17 周岁以上韩国人进行“统一意识调查”。该调查以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分布为依据,通过多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样本,有效样本数量为 1200 份。

③ 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美国乐见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者占 40.2%,而认为“中国乐见朝鲜半岛统一”的占 14.7%。

④ 62.4% 的被访者选择朝鲜,23% 的被访者选择中国,选择美国的只占 5%。

⑤ 该调查要求在“警戒对象”“竞争对象”“合作对象”和“敌国”中对中国进行定义。调查结果显示,38.3%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是“警戒对象”,31%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象”,27.5%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是“合作对象”,3.2%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是“敌国”。

⑥ 调查结果显示,持这一认识的韩国人占 79.5%。

⑦ 调查结果显示,66.5% 的被访者认为“美国会支援韩国”,而 52.4%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会支援朝鲜”。

⑧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对韩国而言构成威胁”的被访者占 80.5%。

分为 62.5 分,虽然明显高于日本,但略低于韩美经济合作重要度。整体看,被访者对于韩美经济合作重要度的评分约为韩中经济合作重要度的 1.1 倍。对比韩美、韩中贸易的实际规模,可以说韩国民众高估韩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而低估韩中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第四 在中美之间的情感偏向是“爱美嫌中”。

中韩两国拥有相似的传统文化,建交以来人文交流规模增长迅速,“人文相亲”经常被称作中韩关系的一大亮点。但是,无论是价值观认同、好感度还是文化影响力,如果把美国和中国进行对比,会发现韩国人明显“爱美嫌中”。

韩国人在意识形态上认可美国,对中国则持有偏见。在韩国人心中,美国社会远远比中国社会更加“自由开放”,也更加“公平公正”。^①实际上普通韩国人很难了解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被访者对于两国社会制度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两国制度的偏见以及带有情感偏向的想象。

2017 年 10 月的调查对韩国人的对美和对中好感度进行了比较。问卷把对日好感度定为 50 分,要求被访者以日本为参照,在 0 到 100 分之间给美国和中国打分。调查结果显示,七成韩国人的对美好感度高于对日好感度,而近半数韩国人的对华好感度低于对日好感度,仅有 27% 的韩国人较之日本更喜欢中国。整体看,被访者的对美好感度评分之和约为对华好感度的 1.55 倍。首尔大学 2016 年的“统一意识调查”也要求被访者在美、中、日、朝、俄五国中选择“最亲近”的国家。调查结果同样显示,选择美国的占大多数,对美亲近人群数量约为对华亲近人群数量的 13.5 倍。^②

但中韩之间的人员交流规模远远大于韩美之间的人员交流规模。2017 年 10 月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半数韩国人都有访问中国的经历,而有美国访问经历的被访者仅占 28.7%。也就是说,中韩之间的生活距离远远比韩美要短。但是,有赴美留学经历的韩国人却多于来华留学经历者。不仅如此,赴美韩国留学生的学历水平高于来华韩国留学生。以硕博生为例,赴美留学生约为来华留学生的 2.1 倍。中韩建交以来,“汉语热”在韩国长盛不衰,但

目前韩国人的英语能力仍然远远高于汉语能力,约为汉语能力的 2.7 倍。^③因此,中韩之间的地理距离虽然更近,但应该认识到韩国人学习美国文化的热情仍然高于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而且高学历人才更多地选择赴美而不是来华。韩国人虽然经常来华,但更认可美国文化。

二、“亲美疏中”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萨德”入韩前后针对韩国民众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说明,韩国存在着“亲美疏中”的心态。那么“亲美疏中”是因为中韩“萨德摩擦”而出现的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其发展趋势如何?影响韩国人对华对美认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第一,“萨德摩擦”是短期因素,长期保守化是长期因素。韩国多个机构对韩国人的对美和对华认识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分析这些调查结果,可见“萨德摩擦”前后韩国人的对华认知变得更加负面,因此目前韩国人的对华负面认知的高涨带有阶段性特征。与此同时,可以发现在过去的 10 年里,韩国人的对美好感与信任非常稳定,一直大大高于对华的好感和信任,因此“亲美疏华”是一个长期现象。不仅如此,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对华与对美态度,可发现年轻人“亲美”的特征更加明显,因此“亲美疏华”具有长期持续的可能。

首先,“萨德摩擦”前后,韩国人的对华认知短期内迅速恶化。比较首尔大学“统一意识调查”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2017 年被访者对中国的敌对意

① 2017 年 10 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5.1%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社会“自由开放”,而 64.3% 的被访者认为美国“自由开放”。只有 4.9% 的被访者认为中国社会“公平公正”,而 25.7% 的被访者认为美国“公平公正”。

② 该调查结果显示,选择美国的占 72.9%,选择日本的占 8.6%,选择中国的占 5.4%。

③ 笔者于 2017 年 10 月进行的调查求被访者对自己的汉语/英语水平在 0 到 100 分之间进行评分。调查结果显示,英语学习普及率为 92.7%,中文学习普及率为 56.9%;能够工作中熟练应用英语的高级英语能力者占 9.4%,而拥有高级汉语能力的被访者仅占 2.9%。英语/汉语能力总分为所有被访者英语/汉语能力分数相加之和。

识明显上升。^① 2016 年到 2017 年,围绕“萨德”入韩的争议在韩国媒体上不断发酵,中国不断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表示反对“萨德”入韩,阐述了“萨德”入韩对于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危害。对此,朴槿惠等政治保守派和保守媒体称“中国干涉韩国内政”,并指责中国没有积极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这种舆论激化了韩国人对中国的失望和怨恨情绪。随着韩国一意孤行推动“萨德”部署,中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反韩”情绪。两国间民族主义情绪互相强化,在韩国的民意调查中就出现了对华好感迅速下滑、敌意迅速上升的现象。如果对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在 2017 年 1 月和 3 月分别进行的两次“对华对美好感度”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在民族主义对抗达到顶峰的这段时间里,韩国人的对华认知迅速恶化。^② 这两次调查中,“美国好感度”得分没有显著变化。^③ “萨德摩擦”引发的民族主义对抗虽然是阶段性的,但“萨德”入韩严重损害了中国民众对韩国的信任,对中韩关系的影响难以短期内消失。对于很多韩国人而言,他们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而选择“萨德”虽然是被动的,但人的行为与情感之间存在趋同的趋势,这种选择会强化他们的“亲美”意识。

其次,远在“萨德摩擦”之前,“亲美疏华”的现象自 2004 年左右就已经出现。韩国学者郑载浩整理了韩国各种机构和媒体面向普通韩国人进行的相关调查结果,指出 2004 年到 2010 年的 22 个调查都证明韩国民众“亲美疏华”。在这 22 次调查中,只有 4 次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相比韩美关系更重视韩中关系,或者相比美国更喜欢中国。^④ 从 2007 年开始,首尔大学的“统一意识调查”连续调查了韩国民众对美、中、日、俄、朝五国的亲近感。调查结果显示,从 2007 年到 2017 年,在上述五个国家中,选择“美国”为最亲近国家的被访者比例始终最高,在 60%至 80%之间,而选择“中国”为最亲近国家比例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低于 10%。^⑤

再次,相比其他年龄层,目前 20 多岁的年轻人更加倾向于“亲美疏中”。笔者对 2017 年 10 月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韩国人的“美国好感度”随着年龄层增长大致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现象,也就是说年轻人和老人的对美好感度

最高。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对华好感度又低于其他所有人群。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所也通过持续的调查研究发现 20 多岁的年轻人自 2010 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同时这一人群也是对朝鲜认识最为负面的。和平统一研究所的报告将这一现象表述为年轻人的保守化,并认为这一趋势与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来自朝鲜的威胁不断加剧,他们对朝鲜的厌恶和恐惧感多于同胞之爱,对美依赖感较强。“统一意识调查”的结果显示 2013 年以后,29 岁以下年轻人的冷战思维越来越明显,认为朝鲜和中国威胁朝鲜半岛安全的比例反而超过了 60 岁以上韩国人。综上所述,近 10 年来,在外交路线上,韩国社会里“年轻人偏进步、年长者偏保守”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如今的年轻人“惧朝而亲美”,并且“亲美疏中”。韩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如果持续下去,那么随着世代更替,韩国社会有可能整体走向“亲美疏中”。

第二,影响韩国人对华对美认知的深层次因素是冷战思维、民族主义与“中国威胁论”。结合发生在中韩之间以及朝鲜半岛上的具体事件来分析韩国人对华、对美认知的变化过程,可见冷战思维、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威胁论”是促使韩国人“亲美疏中”的三个重要因素。这三种因素产生的背景不同,但经常相互强化,共同起作用。

首先,朝鲜半岛是“冷战活化石”,韩国社会存在冷战思维,这是韩国人“亲美疏中”的根本原因。

① 对话敌对意识的增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认为中国是韩国“警戒对象”的被访者比例比 2016 年增长了 10.8%;假设“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被访者中认为“中国会支援朝鲜”的被访者比例增加了 7.9%,认为“中国在中、美、日、朝、俄 5 国中对朝鲜半岛安全威胁最大”的被访者增长了 6.2%。

② 该调查要求被访者在 0 到 10 分之间对中国好感度、美国好感度进行评分,2017 年 1 月的调查显示中国好感度为 4.31 分,3 月下滑至 3.21 分。

③ 峨山政策研究院“韩半岛萨德(THAAD)设置与韩国人对周边国认知的激变”,<http://www.asaninst.org/contents/%ED%95%9C%EB%B0%98%EB%8F%84-%EC%82%AC%EB%93%9C%thaad-%EB%B0%B0%EC%B9%98%EC%99%80-%EA%B8%89%EB%B3%80%ED%95%98%EB%8A%94-%ED%95%9C%EA%B5%AD%EC%9D%B8%EC%9D%98-%EC%A3%BC%EB%B3%80%EA%B5%AD-%EC%9D%B8/>。(上网时间:2018 年 8 月 16 日)

④ [韩]郑载浩《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首尔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358~359 页。

⑤ 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统一意识调查》相应年度报告, <http://tongil.snu.ac.kr/>。(上网时间:2018 年 8 月 16 日)

朝韩关系紧张时,冷战思维更加突出。中韩建交初期,韩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曾经非常积极。从1997年到2003年的数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相比美国,韩国人更希望与中国建立亲密的双边关系。2005年是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韩国人对中亲近感迅速下降,低于对美亲近感,而且此后一直未能恢复到2004年之前的水平。^①而2005年正是朝鲜核开发取得迅速进展、并宣称拥有核武器的时候。朝鲜核危机导致冷战思维强化,应该是这一次韩国人对华对美认知发生反转的重要原因。韩国人“亲美疏中”心态的第二次强化发生在2010年。这一年,朝鲜半岛接连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韩国媒体认为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国袒护朝鲜。首尔大学的“统一意识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年在美、中、日、俄、朝五国中,感到中国最亲近的受访者比例降至最低点。此后一直到2014年,也就是朴槿惠政府前期中韩关系迅速升温时,这一比例才渐渐回升。然而“萨德摩擦”再次强化了韩美同盟和冷战思维,2017年韩国人的对华好感度再次跌到冰点。^②

其次,韩国社会有较强烈的带有“敌对排他”性质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时而指向美国时而指向中国,是民间关系中非常重要的扰乱因素。例如,2003年韩国两名女学生被驻韩美军装甲车撞死,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烛光游行”,进步派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发表了著名的“反美又如何”的言论,韩国社会出现了一波影响广泛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这一年韩国人的对美好感度明显下降,低于对华好感度。2005年,中韩历史学界围绕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产生的“高句丽历史争端”在韩国社会广泛发酵,被韩国媒体以及保守派政治人物进行了政治化的解读。这些舆论称中国是有计划地为恢复古代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而做准备,从而刺激了韩国人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2005年和2006年,韩国人的“对华好感度”走入低谷。^③2008年,中韩之间的一系列历史文化纷争和互联网恶帖事件导致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嫌韩流”,反过来刺激了韩国人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时,韩国人因为反对从美国进口牛肉再次进行反美“烛光游行”。因此,韩国人的对美与对华认知在这一年都明显下降。^④

再次,“中国威胁论”也是影响韩国人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中国威胁论”与“对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但又不尽相同。在韩国社会里,除了有源自冷战思维的“中国安保威胁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都存在中国威胁论。在“高句丽历史争端”的过程中,一些韩国人认为中国试图恢复古代的宗藩秩序,这就是“中国政治威胁论”的一个表现。韩国人担心随着中国影响力继续增长,韩国会在中韩关系中越来越弱势。在经济方面主要存在两种“中国威胁论”:一种担心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韩企业国际市场上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竞争对手;还有一种声音则担心韩国对华经济依赖度过高。也正是应和这种思维,近年来韩国企业和政府都热衷于开辟东南亚等新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文化领域里,韩国对中国的输出远远大于输入,但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进入韩国文化娱乐产业,担心韩国文化产业被中国资本掌控,担心韩国文化因此失去民族特色的声音也开始出现。^⑤每当中韩关系产生波动,“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就会放大。即便中韩关系发展顺利,“中国威胁论”在韩国社会里也一直存在。中韩建交初期,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一度非常积极,随着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情感整体趋势走向负面,这与“中国威胁论”的不断增长密不可分。“中国威胁论”的根源是韩国社会对华不信任,随着中国的发展而悄无声息地不断积累。

三、反思与应对

中韩关系在过去的26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与韩美关系进行比较,中韩关系的弱点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表现为缺少民间互信,中韩关系的社会基础远没有韩美关系牢

① [韩]郑载浩《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首尔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8~359页。

② 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统一意识调查》相应年度报告。

③ [韩]郑载浩《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第358~359页。

④ 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统一意识调查》相应年度报告,http://tongil.snu.ac.kr/(上网时间:2018年8月16日)

⑤ [韩]韩相万“中国的文化资本战略”,《京乡新闻》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1805172051035&code=990100.(上网时间:2018年8月16日)

固。目前来看,朝鲜半岛局势错综复杂,周边各国力量牵涉其中,外力的互动又影响到韩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力量角逐。这时更需要充分了解韩国社会的对美对华认识,作为中国对韩外交的参考。长远来看,今天站在“后萨德时期”的出发点上,需要认真反思过去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夯实中韩关系的社会基础,以期待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未来。

第一,从韩国民意出发看中韩关系、中美关系的近期发展。中韩关系的发展目前既面临机遇也存在风险。中韩关系站在“后萨德时期”的起点上,恢复与发展是基本趋势。从客观需求来看,中韩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无论是督促朝鲜全面弃核、签署和平协定还是在东北亚地区寻求与朝鲜共同进行经济开发的突破口,中国的参与都是必需的。文在寅作为进步阵营的代表,也更注重在中美之间寻求均衡以提高本民族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自主能力。从韩国民意来看,韩美同盟虽然随着“萨德”入韩强化,但大部分韩国人仍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中韩关系在“萨德摩擦”中触底后,恢复和发展中韩关系是韩国的民心所向。目前朝鲜半岛迎来了走向和平的重大契机,中韩如果能够进行积极合作,将成为重建中韩关系互信的良好契机。

但对中韩关系快速改善也不可盲目乐观。以文在寅为代表的进步派虽然追求“均衡外交”,但目前韩国的社会心态倾向于“联美弃中”“信美疑中”“重美轻中”“亲美疏中”。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在寅的外交政策很容易遭到保守派的批评和掣肘。中韩关系甚至朝韩关系改善的进程一旦出现波折,保守派批评政府、批评中国的声音会马上浮出水面。2016年12月底文在寅访华时,占据韩国舆论主流的保守媒体就曾对此进行了诸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报道,大大激化了韩国人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每当朝鲜在弃核问题上出现倒退,美国与韩国的保守舆论也无一例外将其归咎于中国。对华民族主义是破坏中韩合作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是中韩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期。中国方面,“萨德”入韩带给中国人的失望情绪短期内难以平复。文在寅访华虽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社会的对韩负面情绪,但2018年初又发生了韩国海警发400多发子弹警告

中国渔民的事件,在此后的平昌冬奥会上,韩国裁判的判罚又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韩国方面,朝韩和解的良好势头使得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文在寅政府出于推动朝韩合作的需求,还可能鼓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高涨的情况下,要警惕二者之间发生碰撞。

韩美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进一步强化的可能性很大。目前美国握有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钥匙,文在寅政府急于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而韩国民众在朝韩问题上对美国持有较高的信任和期待,保守派更不会掣肘政府联美的步伐。因此,这一轮朝鲜半岛问题磋商,无论进程顺利与否,韩美关系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较小,走向紧密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当然,在朝韩和解、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如果韩美合作出现大的分歧,对美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再次出现。但就目前的民意基础来看,出现对华负面认识的风险比出现对美负面认知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夯实中韩关系的社会基础。在“萨德摩擦”中,中韩关系中“安保互信”与“社会互信”同为软肋的弱点显露无疑。朝韩关系是影响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冷战格局不随中国的意志而改变。从发展中韩关系的角度来看,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着力于夯实中韩关系的社会基础。经济合作一定程度上受两国产业发展结构的影响,需要遵循其客观发展规律。相比之下,中国目前更易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找推动两国社会共同发展的领域。追求两国社会文化共同发展,作为“后萨德时期”中韩关系发展的着力点。

一是要认识到“以利相交,利尽而散”,只有“以心相交”才能“成其久远”。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点是经济合作,与韩美军事同盟相比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更需要坚实的民间认同来弥补。如果中韩之间有坚实的**社会互信**,那么安全与政治领域的分歧能够找到**更多的缓冲和协商平台**。如果中韩之间社会互信脆弱,那么安全与政治领域的分歧难以找到缓冲带,很容易扩大到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领域**。回顾中韩关系的发展过程,每当两国在政

(转第60页)

通过持续改革运动遏制腐败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绩,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要杜绝腐败更需要坚定的思想革新与果敢的制度性政策、长时间的持续行动。

韩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与行政实践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它表明,要想从根本上防治腐败问题,需要通盘考虑、系统施为。首先,全体国民意识要适时跟进。只依靠制度是不可能最终解决腐败问题的。要想根治“腐败病”,就要从根本上转变全体国民的意识,赢得全体国民对反腐败的支持,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否则,治理腐败就会停留在形式层面上,甚至出现一些国民见怪不怪、对腐败现象不以为然的情况,使得贪污腐败现象扎根社会土壤的深层。其次,防治腐败问题最重要的有效措施是制度性措施。虽然韩国颁行了与公务员犯罪有关的法令和法规,但现实却是无法能动有效地惩治公务员的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措施是,反腐败制度改革中针对最终责任人的监察体系必须具有中立性。因此,检察机关为保证其政治中立和处罚公正,也有必要创立新的情报信息机关。在这方面,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的相关制度和做法值得借鉴。在新西兰,高级公务员的调查和起诉由特殊腐败调查处(SPO)

负责;在香港,对公务员金钱交易犯罪的调查由廉政公署(ICAC)负责;在新加坡,公务员贪污罪调查机构为腐败行为调查局(CPIB);美国也有专门负责腐败调查的特别监察机构等。此外,防治腐败有无根本性途径,取决于政府要不要放宽限制的问题。杜绝腐败仅仅靠查处是不够的,必须要消除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各种行政规定的取消与放宽政策。美国国会研究局(CRS)在《对韩国市场开放的展望》报告中指出,韩国严格的经济制度设计导致了韩国官员大规模的贪污腐败案查记录。^①发达国家的国民自主更广更深入,使得对贪污腐败的揭露和查处更广更深入。故而,反腐败必须朝着减少事先限制、加强事后制裁的方向前进。换言之,韩国政府必须通过各种行政制度的改善,放宽行政规定与管理标准,从简化行政程序开始,减少企业之间自由、公平竞争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政府的反腐败体制得以加强和完善。○

(责任编辑:黄昭宇)

^① 李恩荣(Lee Enyoung):《腐败问题如何处理》,NAMAN出版社 2001 年,第 121 页。

(接第 52 页) 治、经济领域里出现摩擦,都会引发民间的民族主义对抗。虽然两国政府每次都能够迅速协商解决争议,但民间感情一旦受到伤害,其缝合却需要更长的时间。站在中韩关系“后萨德时期”的起点上,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建立起独立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高层次、制度化的人文交流机制。二是重视韩国社会动态。在中韩以往的经济合作中,韩方的参与者主要是财阀企业。今后应该在中韩合作中关注韩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例如关心年轻人的失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以赢得更多的正面舆论,赢得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关注和好感,阻止韩国社会日益“保守亲美化”的发展趋势。三是切实做好人文交流工作。中韩之间的人文交流规模虽然庞大,

但质量却比韩美人文交流低。要积极努力在中韩人文交流中做好“人”的工作,有意识地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具有舆论影响力的人物参与到中韩人文交流当中,逐渐消除韩国人对于中国的偏见。四是推动文化融合。中韩建交以来,以“韩流”为代表的两国的文化交流成为中韩关系的亮点。“萨德摩擦”出现之前,中国资本正快速流入韩国文化产业,中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合作出现了融合趋势。文化产业的这种融合有利于促进两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与同化。目前中韩关系将要迎来新的发展期,我们应该鼓励两国文化产业继续合作,这是于无形中消除藩篱、取得认同的理想路径。○

(责任编辑:王文峰)